乡魂与国魂：晚清文人的乡贤传记书写
· ·2018/2 江苏社会科学
对地方人物的记录与彰扬自古就有。魏晋时出现了众多地方人物传记，如苏林《陈留耆旧传》、陈
寿《益部耆旧传》、周斐《汝南先贤传》、习凿齿《襄阳耆旧记》、谢承《会稽先贤传》等。两宋之际，乡贤传
记出现了大规模“地方化”的趋势，地方士人群体更有意识地建构由乡贤组成的乡里传统[1]
。至明清，
为地方人物设立乡贤祠，刊诸地方志，成为一种常态的社会机制。晚清，作为古今中西激荡的转型时
期，文人们同样发掘地方人物，为地方乡贤作传，并有了新的变化。
以梁启超为代表，晚清文人宣扬现代民族国家认同，并输入了各种新的文学样式，包括新小说、新
式史传等。晚清的英雄史传，正是民族国家认同与新式史传的结合。人们还试图从地方建构现代民
族国家，尝试从地方乡贤中发掘理想的国民，于是有了大量的乡贤传记。本文试图从书写的缘起、对
象与策略等方面，厘清晚清文人乡贤传记的整体面貌与时代特征。
一、书写缘起：建构现代民族国家
晚清是中国思想文化发生大变革的时期，其中，外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内外交迫之下，中
国人试图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，并以西方现代国家为模板，宣扬和建构全新的民族国家认同。文
乡魂与国魂：晚清文人的乡贤传记书写
冯仰操
内容提要在民族国家认同与地域认同的双重推动下，晚清文人热衷于以地方乡贤为对象建构理想的
国民。自梁启超开始，人们以传记为载体，展示了众多式样的地方英雄，并从中发掘理想的国民人格或时代
精神。但人们过于侧重乡贤传记的政治性，也造成了人物形象的类型化与书写策略的模式化。
关键词梁启超地方乡贤理想国民英雄史传
冯仰操，中国矿业大学中文系讲师 221116
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贤文化研究”（16ZDA169）、江苏省社科基金“清末民初江苏文
人对地域文化的发掘与书写（1895-1917）”（17ZWC005）阶段性成果。
[1]参见陈雯怡：《“吾婺文献之懿”——元代一个乡里传统的建构及其意义》，〔北京〕《新史学》2009年6月第20卷第
2期。
180

乡贤文化研究
江苏社会科学 2018/2· ·
学成为最佳的载体。在日本与西方文化的参照系下，梁启超为首的晚清文人酝酿并推出了新小说、新
体诗、政论文等，包括新式的史传。历史传记，虽然为中国所固有，但聚焦到晚清，却不能不提及日本
的中介作用。梁启超，是一系列变革的先行者，同样是新式史传的推介者。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时，“史
传体裁文学在日本已至顶峰，硕果累累”[1]
。受此影响，梁启超一方面以日本人创作的西洋史传为蓝本
进行译介，一方面开始了本民族史传的创作。梁启超创办的《新民丛报》（1902年）成为史传的策源
地，自第1号开始设置了“史传”栏目，其后“历史”与“传记”分设，刊载了大量的西洋史传与中国史
传。在梁启超与《新民丛报》的示范下，大量的传记文学纷纷出世，如阿英所言：“传记文学在当时，几
乎成为绝大多数革命刊物不可缺少的部分。”[2]
在《新民丛报》之后，专门设立“传记”（或“史传”）栏目的
报刊有《游学译编》（1902）、《湖北学生界》（1903）、《直说》（1903）、《浙江潮》（1903）、《江苏》（1903）、《中
国白话报》（1903）、《女子世界》（1904）、《安徽俗话报》（1904）、《二十世纪大舞台》（1904）、《白话》
（1904）、《福建白话报》（1904）、《扬子江白话报》（1904）、《直隶白话报》（1905）、《国粹学报》（1905）、《民
报》（1905）、《云南》（1906）、《竞业旬报》（1906）、《汉帜》（1907）、《中国新女界》（1907）、《学报》（1907）、
《神州女报》（1907）、《河南》（1907）、《陕西》（1909）等，其他未设专栏却刊载传记文学的更多。
晚清的传记，最先流行的无疑是西洋史传，之后是本国本族的史传。发掘本民族的历史人物，正
是当时社会的重要倾向。如提倡国粹的章太炎称：“为甚提倡国粹？不是要人尊信孔教，只是要人爱
惜我们汉种的历史。这个历史，是就广义说的，其中可以分为三项：一是语言文字，二是典章制度，三
是人物事迹。”[3]
又如《竞业旬报》时期的少年胡适，号召“爱国的人，第一件，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，不
可忘记”，所谓的光荣历史主要指人物事迹，如“中国历史（上）有个定鼎开基的黄帝，有个驱除丑虏的
明太祖，有个孔子，有个岳飞，有个班超，有个玄奘，文学有李白、杜甫，女界有秦良玉、木兰”[4]
。
于是在全国范围内，民族的始祖以及历代的民族英雄被前所未有的宣扬。如《国粹学报》有黄节
的《黄史》，“条别宗法，统于黄帝，以迄今日，以述吾种人兴替之迹。”[5]
又如《直隶白话报》有《全国名人
传》，列黄帝等人。对此，沈松侨先生有精湛的研究，不仅探究原为神话人物的黄帝在晚清之际被塑造
为“中华民族开国之始祖”的复杂过程，并分析众多历史上的英雄的再造过程，包括“抗御外族”的英
雄，如岳飞、文天祥、郑成功等，与“宣扬国威”的英雄，如张骞、班超等，均被扯出历史的本来序列而重
新排列，纳入到民族英雄的系谱[6]
。
此外，在地域认同的影响下，人们宣扬“爱国必自爱乡起”，典型者如《江苏》所言：“人未有不能爱
其亲而能爱其乡党邻里者，即未有不爱其乡党邻里而能爱国者。今之人竞言爱国矣，吾言爱国必自爱
乡始。”但爱乡的终极目标是国家认同，即“以爱江苏者爱中国，各省亦竞以爱其本省者爱中国，驯致齐
心一致以集注于爱国之一点。”[7]
于是，人们纷纷以地域为起点建构民族国家。在传记文学方面，同样
有以地方乡民建构理想国民的倾向，便有了以地方乡贤为对象的大量书写。正如《东莞旬报》上《史
[1〔] 日〕松尾洋二：《梁启超与史传——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》，见〔日〕狭间直树编《梁启超·明治日本·西方》，〔北
京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76页。
[2]阿英：《传记文学的发展——辛亥革命文谈之五》，《阿英全集》第6卷，〔合肥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687-
688页。
[3]章太炎：《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》，见马勇编《章太炎讲演集》，〔石家庄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7页。
[4]胡适：《白话（一）：爱国》，《胡适全集》第21卷，〔合肥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106页。
[5]黄节：《黄史·总叙》，《国粹学报》1905年第1号。
[6]参见沈松侨：《我以我血荐轩辕——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》，《台湾社会研究季刊》1997年12月第28期；《振
大汉之天声——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》，《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1999年第33期。
[7《] 江苏同乡会创始记事》，《江苏》1903年第1期。
181

乡魂与国魂：晚清文人的乡贤传记书写
· ·2018/2 江苏社会科学
丛》一栏称：“夫中国者，吾之祖国也。吾邑者，中国之一支族也。今与人谈家声道往事，莫不夸其祖若
父之美以自雄焉。祖若父之美不足称。则上下乎吾族之光荣，以自饰焉。吾邑之事实，吾邑先民之遗
迹，其有可以为祖国光国民仰者乎，支族之荣，即祖若父之荣矣。吾邑之盛矣，即中国之盛矣。”[1]
各地的文人以省或府或县为单位，纷纷发掘堪为代表的地方乡贤。梁启超同样是开风气者，除了
译介西洋史传外，创作了大量本国史传，有《南海康先生传》（1901）、《李鸿章传》、《张博望班定远合传》
（1902）、《管子传》、《赵武灵王传》（1903）、《袁崇焕传》（1904）、《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》、《郑和传》
（1905）、《王荆公传》（1908）、《管子传》（1909），其中涉及广东一地的有《南海康先生传》、《袁崇焕传》、
《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》等。
现在看来，晚清的乡贤传记主要集中于报刊与地方史志文集。在报刊的“传记”栏目中刊载了大
量的单篇传记，地方乡贤传记占据了很大比例，尤其是地方性的报刊多设以地方为范围的“传记”栏，
如《安徽俗话报》首推“安徽名人传”，《安徽白话报》设“皖乘”一栏，列安徽一地朱元璋等人，又如《潮
声》，“第五传记记贤人，英雄好汉出乡邦，愿俺潮人刻苦学，保乡辅国名声香”[2]
。此外，晚清文人还专
门撰写了大量的地方史志，典型的有姚光《金山卫佚史》、刘师培《邗故拾遗》、陈去病《五石脂》、苏曼殊
《岭海幽光录》等，收录的多数是乡贤传记。
二、书写对象：作为英雄的乡贤
在明清时期，乡贤乃是“凡有品学为地方所推重者，死后由大吏题请祀于其乡，入乡贤祠，春秋致
祭”[3]
。可知，在传统社会作为乡贤的人物，要具备很多条件，除了本地人，道德事功学问外，还要经过
官方的认可，有浓重的官方色彩。但在晚清，受时代思潮的激荡，各地所发掘与书写的“乡贤”有了不
同的标准，有更多民间与异端的色彩。如留日学生刊物《湖北学生界》的湖北调查部专门调查“历史上
之遗佚”，致力于发掘“旧史诬蔑之英雄”、“旧史湮没之英雄”[4]
。与全国性人物传记一致，晚清的乡贤
书写同样是将与民族国家有关的英雄作为最重要的对象。其中，英雄是各式各样的，既有远古的始
祖，亦有宋明的遗民节士，既有英雄，亦有新兴的英雌，既有反抗异族的英雄，亦有现代性的时代英雄。
在全国性地推举汉族始祖黄帝的同时，各地也开始发掘或书写本地历史乃至传说中的创始英
雄。如浙江留学生在爱乡的激情中，宣扬“吾欲崇拜浙江，吾先欲崇拜造浙江之英雄，吾欲崇拜造浙江
之英雄，吾先欲崇拜勾践”[5]
。《福建白话报》上更出现了《无诸王传》，推举无诸王为“福建开疆始祖”，列
举无诸王的世系，从上古的黄帝开始，历经四十世到无诸王，并明白指出“这位无诸王，是黄帝第四十
世传嫡派的苗裔了”，最后将无诸王同西方的哥伦布、华盛顿相提，推举为“古今豪杰第一”，并表明写
传的目的“我们做他子孙的，如今总要时常记念着无诸王的恩惠，时常学无诸王的人品才好哩。至于
以后无诸王的后裔，因为自己不晓得保护同种同族，互相残杀，所以弄得后来国灭位失。你列位看了
也可以做个榜样，才晓得爱同胞爱同种是要紧的啊”[6]
！
除了各地的始祖外，历史上的英雄也被纷纷发掘出来。宋明时期反抗外族的英雄，因与当时的反
满革命直接相关，更为各地所彰扬。1902年，日本留学生在东京组织“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”，作
[1]侠仁：《史丛序》，《东莞旬报》1908年第1期。
[2《] 叙例》，《潮声》1906年第1期。
[3]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：《辞源》修订版，〔北京〕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，第3117页。
[4《] 湖北同乡会缘起》附录《湖北同乡会章程》，《湖北学生界》1903年第1期。
[5]公猛：《浙江文明之概观》，《浙江潮》1903年第1期。
[6]公孙：《无诸王传》，《福建白话报》1904年第2、3期。
182

乡贤文化研究
江苏社会科学 2018/2· ·
为各省革命志士的聚会，号召以各地的明末烈士遗民为反满的榜样：“凡百君子，蝉嫣相属，同兹恫鳏，
愿吾蜀人无忘李定国，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，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，愿吾吴人无忘瞿式耜，愿吾楚人无
忘蒙正发，愿吾燕人无忘李成梁。”[1]
对地方英雄的发掘，以江浙人士最为积极，某种程度上是针对江南
一带地域文化中“文弱”倾向的反省。江浙人士普遍反省“文弱”的地域风气，江苏人称“乡人之受病
果何在乎”，“曰文与弱二字而已”[2]
，浙江人亦称浙江“文明则未也，而先流于文弱”[3]
。为祛除文弱之
风，江浙人便向历史中寻找节义、尚武等强悍的民族精神，称“欲大复原人之美质，而去既开化者之流
弊，以是养成武事之特质”[4]
。晚明遗民便成为江浙人树立理想乡民的最佳入口，因为“江浙人士，自近
古以来，久以文弱暴著于天下，而当明之季，以坚锐鸣声多出南国衣冠。自江河以北，莫不望风喁喁，
身先归附……即以一代春秋论之，北方之民气远不若南人之盛矣”[5]
。
如刘师培，大量书写扬州一地的历史人物，借以发扬一地的民族主义精神。如《攘夷实行家曾襄
闵公传》，叙述扬州人曾铣抵抗满族，宣扬其“真真是我们汉族的恩人”、“排外的大家”[6]
。《孙兰传》篇末
专门彰扬民族主义情结：“明季遗民若黄宗羲，王锡阐，刘献廷，张尔岐，咸洞明太西学术，然各以高节
著闻，抗志不表，盖学术之界可以泯，种族之界不可以忘也。”[7]
又如柳亚子，其“自束发受书，即有志里
中文献，尤喜考求宋明末造忠臣义士佚民遗老之书”[8]
，并大力发掘“三吴非文弱国”的地方特质，历数
先秦至太平天国时期的三吴人物，慨叹当下“城郭犹是，衣冠已非，士气不扬，全军尽墨”[9]
。柳亚子借
助人物传记发扬民族主义精神，面向全国的有《郑成功传》（1902年）、《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
传》等，面向地方的则有《吴日生略传》、《夏内史传略》（1906年）等，还以乡邦文献为基础做乡贤传记，
前者“聊辑《南疆佚史》及县志所载”，借以期待“邦人诸友，其亦有发愤于种族之大防，不忍使先哲遗
风，扫地以尽，而慨然兴起者乎？余将执鞭从之矣”[10]
。
在各地英雄中，颇值得一提的是英雌的涌现。伴随西方女权思想的输入，中国人开始发掘和塑造
堪为典范的女性。中西的女性典范被大量的塑造，如罗兰夫人、批茶女士等西方女性传记风行一时，
传统女性尤其是晚明女性被作为“为民族殉身”的历史记忆也得到重构[11]
。人们在彰扬英雄时，因材
料缺乏而捉襟见肘，自古“炀于重男轻女之恶俗，而所谓列女节女之篇，皆奄奄无生气，且位置不足以
占全史百分之一。女界伟人乃群在若明若昧之间矣。”[12]
各地方所发掘的为数不多的英雌与英雄分享
着几乎一样的特质。《潮声》“传记”栏中，元末郭贤妇、宋末陈璧娘两位传主拥有共同的元素，会读书识
字，讲究民族气节，正与当时推崇女学与民族气节的风气相合。如郭贤妇，“凡经史百家诗词，他件件
都晓”，在地方面临大军围剿时，作诗一首，竟然“保自己一家人，又并保了溪头寨一乡个人”，被称为
“潮州第一个女丈夫，女豪杰”；陈璧娘亦是“知书理”“明大义”，并劝导乡人尽忠报国。在丈夫伴君赴
[1《] 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叙》，《黄帝魂》影印，台湾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9年。
[2《] 民族精神论》，《江苏》1904年第8期。
[3]公猛：《浙江文明之概观》，《浙江潮》1903年第1号。
[4]铁生：《江苏改革之方针》，《江苏》1903年第1期。
[5]文诡：《浙声》，《浙江潮》1903年第2号。
[6]光汉：《攘夷实行家曾襄闵公传》，《中国白话报》1904年第21-24期合刊。
[7]刘光汉：《孙兰传》，《国粹学报》第9期。
[8]柳亚子：《潘节士力田先生遗诗序》，《磨剑室文录》（上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，第313-314页。
[9]柳亚子：《悲吴篇》，《磨剑室文录》（上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，第210-211页。
[10]柳亚子：《柳亚子集外诗文辑存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，第15页。
[11]参见夏晓虹：《历史记忆的重构——晚清“男降女不降”释义》，《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
年，第114-138页。
[12]亚卢：《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家花木兰传》，《女子世界》1904年第3期。
183

乡魂与国魂：晚清文人的乡贤传记书写
· ·2018/2 江苏社会科学
死后，亦“不食饿死”，被称为“女中大豪杰”，“真是我潮州大有脸事，亦即是我中国个大有脸事”[1]
。因
材料难得，有人或将传说中的人物引为同乡。如花木兰，柳亚子曾作《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家花木
兰传》，慨叹其不见于正史，“读尽二十四姓之家谱，不闻其姓氏，翻遍二千余年之相斫书，不见其事
迹”[2]
。但《安徽俗话报》却将其作为乡贤写入《安徽名人传》，称其姓魏，出生于安徽亳州魏村，隋末唐
初人。《木兰》用白话写成，全篇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民族英雄叙事，将之刻画为爱国尚武的女英雄。木
兰从小便不喜涂脂抹粉，偏爱骑马射箭，等到父亲被应征时，想道：“我当初学了许多武艺，原想要和外
国人打仗，显显我们中国的威风，叫他见了我中国人，不敢不恭敬，不敢不低头，于今北边事急，我正可
趁这个时候，显了我的本事，一来杀败胡人，可以报国恩，二来替我爷去当兵，可以报爷恩。”除了木兰
有爱国思想外，其母亲亦被赋予现代气息，如言：“我们身为女子，不能替国家出力，吃死饭，睡死觉，真
真惭愧。女儿，你能去替国家出力，当兵打仗，杀退北边胡人，这件事，不但做母亲的，脸上生了许多光
彩，就是我们黄帝老祖宗，也要在地下含笑了。”[3]
乡贤传记不仅宣扬反抗异族、爱国尚武的英雄，还关注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英雄，如投身地方自
治、实业救国、海外殖民的人物。柳亚子在《吴江志士陶亚魂小传》中，刻画了一位投身地方自治的志
士，渲染传主的各种事迹，如在黎里组织演说会、创办《新黎里》、发起体育会等[4]
。《云南大实业家赵老
人传》亦具独到的眼光，不叙述云南的忠义之士而选择实业救国的赵老人，其理由是：“窃谓云南一省，
普通当从禹域之名，而最近之历史，则云南殆为杨武愍公诸巨子之云南。至于钱南园先生辈与云南之
关系，其所以贻留我后生者，不过宋明诸儒所自相标榜之气节文章四字，究其实，可以成文天祥陆秀夫
之名，而不可以救陆沉之患。君子为我民族痛焉，杨武愍公之伟烈，容他日收集记载之，今先与我父兄
子弟言赵老人之生平。”该传通过赵老人的事迹宣扬实业救国的重要性，指出当今世界是实业竞争的
世界，“立国于二十世纪以后，几于有此则立，无此则不立。言富强于二十世纪以后，几于是此则富，非
此则不富。此者何，矿业国也，制造国也，商业国也，陆海军国也。”而赵老人正是实业救国的典范，“老
人之初试于开矿业事也败，再试又败，又再试，又再败，久之，巨万之家资倾其大半。”[5]
梁启超亦别树一帜，发掘广东、福建两地殖民东南亚的前贤，作《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》，叙述梁道
明等九人崛起南洋、开疆辟土的事迹。梁启超自感材料有限，试图求之于地方传闻，言：“吾传八人而
寥寥不及二千言，吾不敢于所有资料之外，铺张焉以侮先民，而前史之成文与故老之口碑，乃于此区区
者之外而莫余畀，使我对于前贤满胸膜拜之诚。竟不克自献也，是乃深可悲也（叶氏之事，去今未远，
乡人当尚有能言之者，若赐邮教岂胜大愿）。”并宣扬海事思想与国民元气之关系，“九人之中（并潘和
五）粤人七而闽人二也，自今以往，吾国若犹有能扩张其帝国主义以对外之一日，则彼两省人，其犹可
用也。而其他沿海诸省乃至腹地诸省，亦何遽多让，在养之而已。”[6]
由上可知，在晚清的乡贤书写中，传主的范围完全溢出了传统乡贤的范围。人们选择的地方乡
贤，多以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远近为衡量标准。这一标准，显然是为了给各地方人们提供可供寄托与效
仿的偶像，进一步强化对民族国家的认同。
[1]参见模妽女子稿：《郭贤妇传》，《潮声》1906年第12期；润：《陈璧娘传》，《潮声》1906年第6期。
[2]亚卢：《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家花木兰传》，《女子世界》1904年第3期。
[3]薶照演稿：《木兰》，《安徽俗话报》第6期。
[4]柳亚子：《吴江志士陶亚魂小传》，《磨剑室文录》（上），第120-124页。
[5《] 云南大实业家赵老人传》，《云南》1906年第2期。
[6]中国之新民：《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》，《新民丛报》1905年第63号。
184

乡贤文化研究
江苏社会科学 2018/2· ·
三、书写策略：从乡魂到国魂
梁启超所推崇的西洋传记，不是呆板的叙述传主的史实，而要求对传主的功过与价值进行概括与
评价，正如其在《李鸿章传》的序例中所言：“中国旧文体，凡记载一人事迹者，或以传，或以年谱，或以
行状，类皆记事，不下论赞，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”，而推崇西人传记与司马迁《史记》的“夹叙夹议”[1]
。
晚清的乡贤书写，也大致由两部分杂糅组成，一部分是乡贤事迹的叙述，另一部分则是乡贤价值的议
论。晚清乡贤传记的时代特色，表现在对传主类型的选择上，即与民族国家有关的英雄成为优先序
列，更表现在对传主的价值判断上，即将传主置于地方、国家、时势的网络中加以定位。
无论古今，乡贤都是一地方堪为典范的人物，被视为一地方的精神支柱。如广东《东莞旬报》称：
“吾邑山川钟毓，贤哲挺生，或以道德传，或以忠节著，或以事功显，或以文学名，以及瑰伟奇特之材，高
尚独行之士，稽诸史乘，更仆难数，邑人宜如何慨慕前修，继承之而步武之乎。盖乡先生者，我东莞之
魂也。”[2]
晚清文人的乡贤书写发掘一地的乡魂，最终目标却是树立超越一地的国魂，是以在乡贤与国
民，乡魂与国魂之间建立关系，最终将乡贤、乡魂打造成理想的国民、国魂。因此乡贤书写往往将传主
置于乡与国的价值网络中，凸显传主对于乡与国的意义。
乡贤传记将个人纳入地方、国家等群体的写法，实与当时流行的新史学相关。1902年，梁启超在
《新史学》中论及历史书写中个人与群体的关系：“善为史者，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，不闻以历史为人物
之画像；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，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。中国之史，则本纪列传，一篇一篇，如海岸
之石，乱堆错落。质而言之，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。夫所贵乎史者，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、相
竞争、相团结之道，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、同体进化之状，使后之读者爱其群、善其群之心，油然生
焉。”[3]
即人物只是历史的材料和手段，因此传记的重心不在个人，而在“一群人”，也正是个人之上的国
家、民族以及时代。
早在1901年，梁启超为康有为作传，便将之纳入地方与国家的网络中：“吾粤之在中国，为边徼
地，五岭障之，文化常后于中原，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，开化既久，人物起，而吾粤无闻焉。数千
年无论学术́㊣ㅂ遁က年民族以묄委学ꐏ物。
。
能。
中人
梁Цက
人梁⨨㑠ʃ䙨̕㘆摜%㛁쀀ᬱ砀翻耰Ȑ年Ѐ⢒䠈(鉃(鉃两ʉ␴⍐ɰ⊢묀✂外㔀✂⠉ဂ瀢萣倂楢ꊻ&阨㑠ʃ䙨̕䑢㤼%㛁쀀ᬱ砀翻耳鞀，
。
民族以㡹ဂ灲ꑉဂ灲Ἠ㑠ʃ䙨̕䠄椬%㛁쀀ᬱ砀翻耸!՘
以Ϡɰ琍ɰ爁씀✇鸣씀✇䠃灲灂荆(缺耱吒쀂卬ᰀƳἵ➀͒码Ҙꀀ即⩐ɰ瑳一✇“倂灲∉ဂ灴蜉ဂ灳舕&搸ㅐɦ䄋腐ɦ䡰抃䘀⠴暀ㅔሀ鏀ɓ氜댟翻考剸不㠀㙠以间ɦ䢀耂虈㑠ʃ䙨̕㘆摜ऱ靬ᰀƳἵ➀͒砃!ĺ�∨㑠ʃ䙨̕㘆摜ऱ靬ᰀƳἵ➀͒砃㕰，
新术
文、。
。
文。
：。
年、
年中—̆铅鈁䀰슜夠Ꮲ荆(缺耱呆⎓슒⁈氜댟翻考剸̔不՘
同⩉—̆ꊤ鈁䀱瞚䤠ᐃ略꒒ŀゐ앀⭔，
，
能民族以䶤梁、
年⩉–䄀合人贵ࠨ㑠ʃ䙨̕㘆摜❐覆쇀ㇳ剸5➀。ဓꀀヲ∾㺀鈢⏬ヲ∳㡰鈢⍎⠴怂荆栃ᕄ戹㰧傉蛁쀀ᬱ砀翻耲ဂ 
吾䬢⌳得༢⌣ᝋ∣␓ד⌣煠㈱权刣⏲∲㇯न㑠ʃ䙨̕说़❐覆쇀ㇳ剸5➀㕙ぅ缀
<

<
梁
中，新॒∲ㄴ⬢㉃͢∲ㅶ惲∲ㆸ惲∲ㆰ숢㈱磒눣␵ଢ⌣ゕ∣⌳ヲ∲㉤͢∲㄰䐢⌣ጨ㑠ʃ䚈̕㝲㤼❐覆쇀ㇳ剸5➆鈐儡㡠，
能仆∲㆞仆∰ル樿∣大᫢∰㈢ュ㊃䘀⠴暀ㅓ䍔雂垗䥬ᰀƳἵ➀͒砃!ĺ� థ之 ఑ҕ
，
，
能࢕，
年ध
，年年义蜗䡰鄀蜗䣦鄀蜑ဲ比蜔⇢ဈ煂⴨㑠ʃ䙨̕㥈鑌␀蘀氜댟翻考剸̨锁䋀开粤ࡱ麑턘᧡清퀈熞岖ᴀ蜙釐ࡱ麝铂荆(缺耱占晅쉀ہࡠ쀀ᬱ砀翻耵䊀新故ᬀࡰᇐࡱ鸳粤ࡱ鸐围ࡱ黋ᴀ蜙古ࡱ銈㋐ࡱ麒步᧦鄀蜙ᴀ蜙抃䘀⠴暀ㅔሀ鏂䀈怆쇀ㇳ剸5➀ေ՘ 年Ϡࡱ麲ᴀ蜙봀蜙鄀蜙봀蜙㋐ࡱ鸗Ϡࡧ渔缾盠狃斆盠耷塧渇炑盠繩ဈ杮蠃⠴怂荆栃ᔶ٤尣瑑氜댟翻考剸̀℁㨀，
新人೦年，
：
年
，
。
。
：，
，
。
人。
，
年物ᥳᐩ以ᥳᑒ垕ᥳᒐ垕᥾蜜祑霳晚ད韡냏㆗볳᥾⇢荆(缺耱占晅셲䀃氜댟翻考剸̲ᄅ声
道
新，
，
年क़馈督ᖉ颂㍁墙蠨ౘ馈₴얉颂૒脈ဨ㑠ʃ䙨̕㥈奄섀葕氜댟㝣銙耨缺耹頂╘<
< <
<
<
<
<
<
<
<
<
<
<
<
<
<
<
<
<
<
<
<
<

乡魂与国魂：晚清文人的乡贤传记书写
· ·2018/2 江苏社会科学
远……极力推崇其“所谓无家而以中国为家”[1]
。
受梁启超的影响，当时的乡贤传记均试图在乡贤与整个时代建立联系，将乡贤塑造为理想的国
民。如飞将军《